

穷孩子、富家子与濒临破碎的美国梦

——读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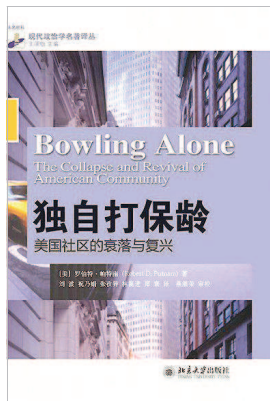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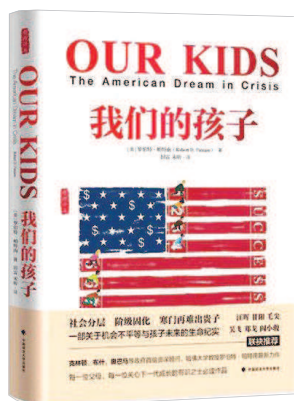
任军锋

通过讲述那些穷孩子们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绝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评政府的无能、谴责所谓社会的不公，更不是要将危机的源头归咎于单一的责任方，而是条分缕析，从诸如婚姻家庭、学校状况、邻里社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导致阶级隔离和机会鸿沟在美国愈演愈烈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根源。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被逼入“特朗普时代”：民选总统公开食言，自由媒体谎话连篇；霸权国家嫁祸于人、出尔反尔、蛮不讲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出乎意料之事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道德底线一再被下调，教科书上学到的概念框架纷纷失效，由于受到反复刺激，我们的神经感觉麻木且迟钝，又莫名地失落加愤怒。我们不得不审视：在浮躁、焦虑、喧嚣、分裂、怨怒等诸多症状之下，一定潜藏着某种深层的与日俱增的社会危机。

“特朗普时代”的主体并非特朗普总统本人，即便幸得冠名，特朗普却称不上这个时代的首要缔造者，它毋宁是之前数十年美国乃至西方政治、社会危机长期积淀的衍生物：美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日趋陷入党派倾轧的旋涡无法自拔，竞选沦为公开的金钱游戏，政府职位被政客明目张胆地拿来作为权钱交易的筹码，利益集团彼此掣肘，致使亟待解决的公共政策议题只不过是政客们为赢得职位的华丽许诺；显得振振有辞，实际却是语词的泡沫；民生艰困、社会嫉怨，政客们却在自己一手编造的美词丽句构筑的幻象之中非常醉且非常美，意识形态僵硬，公职家族化，国家软弱，政府低效，法律制度陷入功能性失调式的政治均衡，政治衰败日趋明显……对此，政治学者福山业已作出了系统诊断（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四部分，第413-499页）。可惜知识界或囿于某种意识形态惯性，或为派性立场裹挟，福山的著述只是被断章取义，随意用来为各自的立场背书罢了，致使迟迟无法真正进入福山的现实关切和理论视野，即便迎来了特朗普的“意外”当选。

如果说福山对缔造“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根源作出了



作为职业学者的帕特南十分重视公共写作，他试图通过对小群体的关注，揭示美国社会的一些大问题。

全方位诊断，帕特南则通过《我们的孩子》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给出了系统分析，该书副标题“危机中的美国梦”传达的正是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切危机意识，与2000年发表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相比，《我们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深深的焦虑、伤感甚至悲愤，眼看自己深爱的祖国疲态日显，贫富悬殊导致的机会鸿沟愈演愈烈，穷孩子和富家子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差地别的“美国”：富家子住在宽敞的临湖别墅里，日常琐事有保姆管家打理，高墙门卫，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父母亲戚邻里朋友的助力下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而那些底层的孩子却生活在毒品泛滥、暴力横行的贫民区里，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稳定的家庭、良好的教育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充满希望的前途，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生存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无奈的

挣扎，他们的人生是一曲曲在他们出生时即已被写定的悲歌。

《我们的孩子》针对的是当下的美国，折射的却是未来的美国。《我们的孩子》无疑是帕特南的一部“发愤”之作。在对美国社会长期且持续的观察研究中，帕氏目睹美国人的社会关系网不断塌陷，人们彼此隔离，个人沦为一个个孤岛，阶级差距不断叠加，由此带来的机会鸿沟与日俱增，下层阶级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外在条件相继丧失，他们的下一代的前途早早地被定格在贫困、羞辱、绝望之中。在书末题为“《我们的孩子》的故事”的附识中，帕特南和他的研究助理以动情的笔调这样写道：“我们在本书中讲述了许多穷孩子的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我们绝没有在样本上动手脚以扩大穷孩子的困境，如果说有的话，反而是我们实际上低估了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悲剧人

生，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孤独苦伶仃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遇见的许多事令帕特南和他的团队心碎不已：他们原本打算访谈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子，但男孩儿的父亲之前问他们，他是否可以把自已的小女儿也一起带来，只是为了看一眼真正的大学毕业生长得什么样；依照惯例，他们会向参与访谈的家庭支付50美元的酬劳，中上阶级的父母一般会婉拒这份报酬，但对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说，这点酬金无异于雪中送炭，足解燃眉之急，因为那天家里正在等米下锅，50美元解决了他们拖欠的燃气费和饭钱，而另一位女孩则用这笔钱去吊唁前几天在黑帮火拼中被枪杀的一位亲戚。

在过去40年里，美国社会组织纷纷解体，人们日趋沦为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体，他们彼此疏离、冷漠，整个社会消极被动、一盘散沙，对此，帕特南不无忧虑地写道：“在常规环境下，群众对政治稳定仅有微乎其微的威胁，而且这仅有的危害也会因群众自身的冷漠而化解。在这种情形下的政府可能不那么民主，但至少可以保持稳定。而一旦陷入严峻的经济或国际压力，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和美国的那种压力，原本‘消极被动’的群众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歇斯底里，值此之世，就会有反民主的煽动政客用极端的意识形态来操纵群众。”（同上，第269页）不幸的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的上台，最终使帕特南的上述隐忧一语成谶。现在想来，当初帕特南在大选接近尾声时在美国政治学界发起针对特朗普的联署签名，绝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分歧或党派立场分野，实在是无法释怀的忧愤之举。

公共写作的积极意义

对于学院里的研究者尤其是政治科学学者来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构成了他们时刻需要面对的张力甚至矛盾，学院研究者经常的疑虑在于：关注公共议题，是否是学术研究本身职责所在，是否应当作为研究者的旨趣和目标。然而，在帕特南看来，诸如此类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只不过是研究者作茧自缚式的想象的产物。事实上，好的研究从来就是两者兼得，而不是非此即彼。对政治学者来说，科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科学真理与公众关切、科学与政治、象牙塔与公共广场，并非惯常所认为的非此即彼，而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政治学者孜孜以求的应当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科学”（a more engaged political science）、“具有批判眼光的变革主义的政治科学”（a critical, reformist political science），它要求政治研究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做跨界思考，抛弃所谓“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或“事实无涉的哲学批判”，“问题”先行而非“方法”先行，寻找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积极的跨界合作，通过提出新的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突出那些被忽视的价值，找出影响这些价值的关键要素，揭示事实与价值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与社会公众展开真诚的对话，政治科学家能够对公共生活做出积极贡献。在2002年新一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帕特南强调指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关注最为紧迫的公共议题，政治科学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使命，对公民